

文章编号: 1005-0523(2005)05-0050-04

# “官本位”的经济根源及其启示

洪英俊, 姚卿善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官本位”是自然经济关系条件下, 权威的人格化。高度集权的传统社会体制使它固定。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 “官本位”现象延伸至今。官本位现象的消除要靠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

**关键词:**小生产农业经济; 集权体制; 官本位

**中图分类号:** D0-0

**文献标识码:** A

## 0 引言

对我们当今存在的官本位现象, 有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意识来认识。与这个观点不同, 我的观点是这一现象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 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这不能不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状况。

## 1 小生产是官本位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需要稳定有序。要维持稳定有序, 不能没有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里指出: “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 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 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 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 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 在危险关头, 要拯救大家的生命, 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sup>[1]</sup>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 权威一般是直接表现在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制、法规、制度上。所谓“有问题找市场”。因为人们之间的联系广泛, 市场经济信息传递的横向性, 使信息资源共享、信息公开。人们需要遵守的主要是一定的自然规律、社会法制和市场规则。

在分散的个体小农业经济条件下, 人们之间缺乏联系,

信息传递是纵向的, 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的权威主要靠一定职位上的人来行使, 通过相应的制度来规定, 再影响人们的思想, 形成一定的观念来强化。以至在经济还未达到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情况下, 还得“有问题找市长”。

中国特殊的地理条件形成的中国古代经济正是封闭分散的农业经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是一大片肥沃的平原, 多旱少雨。东南远离大海, 西北有高原与大漠的阻隔。这种地理条件使中国古代的经济主要是封闭、分散的小生产农业经济。

农业生产是定居, 固守一处, 生产区域的固守性造成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人们之间缺乏联系, 所谓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极度的分散需要高度的集中。因为: 第一, 在抵御自然压迫方面, 多旱少雨的地理条件下的分散的个体农业, 要解决灌溉问题, 兴修水利(如都江堰的修建), 以及修筑某些工事解决运输(如大运河的开凿), 需要政府权力来集中人力、物力进行; 第二, 在社会压迫方面, 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如万里长城的修筑), 也需要政府权力集中人力、物力来进行; 第三, 男耕女织的农业小生产彼此缺乏联系, 形不成一种阶级力量, 小生产自己不能代表自己, 一定要别人来代表。要保护农民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 也需要一种至高无上的政府权力。

在分散的情况下, 要提高政府权力的运作效率, 权威就需要人格化, 这使“官本位”的产生成为一种必要。其运作机制是政治权力物化为官位, 不同等级的官位, 意味着大小不

收稿日期: 2005-02-18

作者简介: 洪英俊(1946-), 男, 江西奉新人, 华东交通大学教授。

等的政治权力,官位的政治权力又人格化在相应的官员身上。

社会发展到今天,在经济还未实现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情况下,小生产心理和传统观念还难以消除。这样,各种组织单位,为了其职责的有效运行,其单位都要“折算”成行政级别,科级单位、处级单位、厅级单位等,非行政职务,往往要注明其享受哪一级待遇。这种“官本位”现象,就像市场经济中的货币要折算其含金量的“金本位”现象,“官本位”正是这种生产关系的人格化。

## 2 高度集权是官本位的社会体制根源

本来,权威是成员共同授予,依靠非行政权力实施,由非理性和个人情感因素来维持的对他人的影响和控制力。这意味着权威是人们接受命令时是大多数出于自愿,但要更好地维持稳定有序,提高社会的活动效率,光靠自愿是不够的,不自愿也得服从。这就需要使权威法定化、制度化。权威一旦法定化、制度化,便转化为权力。权力意味着把一定的意志强加于一定的人群共同体,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服从。

传统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使“官本位”作为一种官僚制度被固定,从而为分散的农业经济社会的管理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技术操作上的运作机制,它给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它成为中国中世纪先进和近代落后的共同原因。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能把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创造出了比欧洲中世纪高得多的文明。始建于战国的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华阳国志》),万里长城令西方惊叹。这种体制的优越性使中国直到清朝的康乾盛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而它的消极影响也是很突出的。它使中国在近代落后下来。因为这种体制造成智力资源的浪费,束缚着人们的创造力。在古代中国,一方面,“官本位”使人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生活方式由其政治上的等级决定;另一方面,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为贫寒之士提供了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与希望。在这种社会中,一个人如果想在社会中取得一定的地位,唯一的道路是读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队伍。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入仕才是正途”。而技术创新、科学研究等,被视为雕虫小技,属于下品。只有升官,才有社会地位,甚至只有升官才能发财,其它致富之路都被堵死,形成一种“按政分配”的现象。这种导向使大批人才浪费,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脱离社会经济生活实践,而致力于仕途,空谈政论。

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sup>[2]</sup>,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体制下,官位抹去了一切其他职业的灵光。甚至在人们心目中,官位不仅抹去了世俗世界其它职业的灵光,而且使神的世界黯然失色。中国古代社会皇权大于神权,皇帝为天子,即天的儿子,但却是老子跟儿子姓;汉朝天姓刘,唐朝天姓李,宋朝天姓赵。思想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原理

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来,神权成了皇权的婢女。《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敢大闹天宫、龙宫和阎王殿,却不敢闹人间的皇宫。宋明小说中的百花仙子,面对人间君主武则天的寒冬“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催”的圣旨与神权安排的按季节开花的指令冲突,只能选择遵循人间君王的圣旨。牡丹仙子来迟而被贬至洛阳。

“高度集权”和“按政分配”的影响甚至一直延伸到近现代。这种现象严重地阻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因为“高度集权”和“按政分配”把人们导向于谋人而不是谋事。高度集权、缺乏民主,就有可能使臣子和下属在“绝对服从”和“取而代之”之间选择。所以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不仅“伴君如伴虎”,而且“伴臣也如伴虎”的现象。甚至到了现代,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出现了人们对本单位领导出现造反派和保皇派二派的对立的现象。这种氛围把相当一部分人力资源引向并耗费在人际关系的争斗上。文革期间,蒯大富说:“我心里想着权,眼中盯着权,迟早要夺权。”文革期间的“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表面上看是无政府主义,实质上是一些人追求大政府主义和依附什么人的反映。

在传统集权体制下,社会处于身份社会而不是业绩社会。个人的升迁,往往不以个人的发展为必要条件,而靠外力和凭借特殊关系而达到。人们瞻前顾后于人伦关系之间,致力于“仕途”、“出人头地”,而鄙视“奇技淫巧”的科学技术。人们之间的竞争往往是为了在人身依附的阶梯上多爬高几级而展开的窝里斗。在实行高度集权体制的前苏联,曾出现斯大林一个人头脑替全国两亿人思考的状况。这种体制使斯大林破坏民主,践踏法制的事件得以发生,出现雅哥达、叶索夫、贝利亚等踏着别人的尸体以图往上爬,而且“前赴后继”,自己也成了被别人踏的尸体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固然,这种体制有它的优越性。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曾使前苏联一度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最先卫星上天的是前苏联,最先载人飞船上天的也是前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使中国解放后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

但这种体制的缺陷也是很突出的。它造成微观缺乏活力和产生官僚主义。在这种体制下,难免不造成邓小平指出的“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sup>[3]</sup>”;造成下级对上级无原则地服从,“尽忠”,唯唯诺诺,或者窝里斗;有的人不是算计事,而是算计人;有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自认为是父母官,搞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等现象。而这个“个人”,正是权威的人格化。权威的人格化造成职位上的个人的神秘化。

## 3 知识等级制强化了“官本位”思想观念

官员的权力本来是人民赋予的,但权力一旦人格化,在操作上,官员的权力就成了由上级赋予的,而实际上往往又

是由上级某个人赋予的,这使“买官卖官”现象的出现成为可能。

在前苏联斯大林体制下,政府官员由上级层层任命,这在提高行政运作效率的同时,也造成官员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现象。

在古代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体制下,一般情况是皇帝掌握着人们的生杀予夺大权,上级官吏掌握着下级官吏的升降予夺权力,平民百姓要靠当地“父母官”的关照,人们很难从官员和平民之间抽象出平等的人格来。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儒林外史》中,人们对中举前后的范进的态度就是这种社会普遍现象的写照。原来被他丈人颇瞧不起的范进,中举之后就成了令人敬畏的文曲星。因为中举了,就进入官僚队伍的人才库了。

官员的权威靠保密制度来维护,用中国古代历代封建统治者信奉的信条来说,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论语·泰伯》)。老子认为只有“常使民无知无欲”,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圣人之治”(《老子·三章》)。这种保密制度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知识等级制。马克思指出“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sup>[4]</sup>

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就有可能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sup>[4]</sup>

在这种体制下,信息传递是纵向的,要得到一定的信息资源,就得在一定的职位上。不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且“不在其位,不明其政”。上级再平庸,在下级面前也可能显得高深莫测。

这样,终于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一定时间内,不仅“官”是人们竞争胜负的裁判(官员个人往往同时又是运动员),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官位”的高低往往成了衡量人们成就和价值大小的尺度,成为检验人们言行是非的标准,成为判断人们言行价值大小的依据(例如“唯上”的社会心态的存在)。追求行政级别的升级成为企业盲目扩大规模的动因,重在做大,忽略做强。

#### 4 “官本位”现象为何至今还未完全消失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体制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sup>[3]</sup>

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是“官本位”现象至今还存在的重

况决定着一定的体制和社会观念。

第一,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在生产关系上,需要利用行政集权手段,很快建立公有制。但面对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生产力条件下的“一大二公”和小生产的习惯心理,要维持社会的稳定有序高效运行,最有效的办法是行政集权。而行政集权的有效运作机制是“官本位”,“官本位”的消极影响是产生官僚主义。

第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制难免有不完善的地方。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通过单位、公社、街道、户籍等制度网络几乎将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纳入政治生活的轨道。通过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僵化的劳动制度和单位制度,僵化的人事管理制度,将人们分成农业人口、城镇居民、工人、干部等不同身份的群体<sup>[5]</sup>。不同群体的社会地位和享受的待遇是不同的。这些体制在当时有它存在的理由,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一定的弊端,人们向往着农转非、招工、提干。

客观存在的集权体制、事实上的身份制度和“按政分配”,激发了一些人追求官位的内在动因,强化了人们心目中“官本位”的意识。

在前苏联,斯大林模式培植了一个党政军高薪特权集团。党政军高薪特权集团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后来发展为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掘墓人。斯大林逝世时的1953年,部长级工资是11 000卢布—14 000卢布,当时最低工资约为250卢布,相差44—56倍。要注意,这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国家规定由身份不同造成的巨大差别,而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人努力不同造成的差别。苏联实行兼职又兼薪,斯大林身兼数职,领取几份工资。斯大林个人生活是实报实销,他的工资袋从未启用。党政军官僚集团还享有高薪之外的很多特权,如住房、别墅、汽车、游艇、特殊食堂、特供商品等<sup>[6]</sup>。看到这种“集权体制”和“按政分配”,我们就不难理解斯大林体制下,有些人权力斗争和内耗何以那样激烈与残酷。显然,“按政分配”激发了一些人追求官位的内在动因,而“集权体制”为人们激烈残酷的权力斗争提供了外部条件和手段。而这些又强化着人们心目中“官本位”的观念。

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斯大林践踏民主,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件不可能发生<sup>[3]</sup>。邓小平说,毛泽东看到了其中的制度原因,但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sup>[3]</sup>。

第三,超出社会经济条件的政策产生的影响。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sup>[7]</sup>。”列宁指出:“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sup>[8]</sup>可是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对“按劳分配”这一“资产阶级法权”(后

来译作“资产阶级权利”)加以限制。“按劳分配”起点公平,结果可能不公平,加以限制后,于是不仅在经济上起点和结果都不公平,而且在政治上也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了,封建特权残余现象得以延续。人们的能量被导向对官位的追求,或者企盼“父母官”的恩泽。

## 5 结论和启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一、建立在分散的农业小生产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度集权体制是当今现实生活中官本位的历史根源。其中小生产是官本位的社会经济基础,高度集权是官本位的体制根源,而知识等级制强化了人们“官本位”的思想观念。所以,通过体制改革,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是清除官本位的根本途径。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经营,管理人员的待遇只与企业经营效果有关,企业变成“无级别”单位。这样才有利于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彻底转变,才能实现“From state to contract”的转变,即从身份社会向业绩社会的转变,促进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促进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从而在人们心目中树立法制的权威,才能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使“官本位”的观念淡化以至完全消除。

二、权威要法制化,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从制度上使“官本位”的现象得以消除。因为权威人格化,而人的态度是会改变的。所以邓小平说,要使法律和制度不依领导人的改

变而改变,不依领导人的意见改变而改变<sup>[3]</sup>。

三、马克思指出:“只有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在思想上、在抽象概念中成为特殊利益,才能铲除官僚政治;而这又只有在特殊利益在实际上成为普遍利益时才有可能。”<sup>[4]</sup>所以,江泽民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按照什么来建设党深入思考,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指导体制改革、清除官本位的精神力量和理论指导。

### 参考文献:

- [1]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5] 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 [6] 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7]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8]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Economic Source of “Officer Standard” and Enlightenment

HONG Ying-jun, YAO Qing-sh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Officer standard” is personification of authority in natural economic. It were fixed by centralized power system of traditional society. “officer standard” is going on now for a variety of complex reasons. “officer standard” was dispelled by industrialization marketwise modernize of economic.

**Key words:** scattered agricultural economy; centralized power system; officer standard